

意义世界与文化结晶： 青少年流行语的社会学考察

□何祎金

摘要：青少年流行语是独特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现象，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关注。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青少年流行语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汇聚了全球化和地方文化的互联网成为青少年可以调用和调适的创造性资源，通过语言实践塑造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并且，在当代青少年通过流行语创造的意义世界中，日常生活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流行语；意义世界；文化结晶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8.0118

流行语的研究既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语言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种社会学转向，由一种内部的关注语法和语义的语言学视角，转向关注语言生产和实践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过程，并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青少年流行语成为一个突出的语言和社会现象。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大量与网络相关的流行语不仅是社会变迁的语言指标，同时也是青少年通过生活实践所衍生的文化结晶，亦代表了他们所塑造的意义世界。

本文对青少年流行语的考察，首先梳理了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对语言学方法的拓展，指出对青少年流行语的研究，需要关注流行语的生产和实践，以及意义的生成。并且，语言是一个充满内部张力的文化和社会产品，在合法化和标准化的语言之外，需要面对不同群体和文化的冲击。其次，流行语在塑造青少年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少年在网络时代的符号相遇，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策略和语言共同体。但是，作为一套亚文化符号体系，它们本身是青少年日常生活实践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在美学和符号学意义上制造文化区隔。在一些因网络热点事件和议题兴起的流行语之外，实际上很多流行语是和生活相关的词汇。因为结合了青少年的日常经验，这些易于

受到忽视的词汇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最后，青少年流行语固然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但是在科技日益嵌入生活的世界中，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汇聚了全球化和地方文化的互联网本身成为丰富的创造性资源，可以被不同群体和文化所调用和调适。青少年的流行语汇聚了大量欧美、日韩和ACGN（动画、漫画、游戏和小说）文化，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杂交”特征，当代青少年亦在自己塑造的意义世界中成为跨文化的“文化移译者”。

一、关键词：流行语与社会变迁

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语的出现和变化，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关注。根据学科特点，语言学视角的解读，会针对流行语的语义和语法特征进行分析，而社会学则侧重关注语言生产和实践的历史与社会过程。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和词汇含有文化、群体和阶层的属性，在语言实践过程中还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社会性还体现在它们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词汇，不仅有特定的意义，亦表达了特定的审美和价值。

在社会学对语言问题和现象的考察中，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与布迪厄对语言实践的讨论是有代表性的理论参照。在威廉斯那里，对社会文化和变迁的理解，可以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来实现。其代表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本来是作为《文化与社会》的附录部分，但是因为篇幅过长而另行出版。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威廉斯从个人经历入手，揭示了语言的阶层和价值属性。各个群体之间实际上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威廉斯强调语言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和信念，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语法或者语言学标准来判断它们的“对错”，因为没有哪个团体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存在语言的交锋与对立，会有主流团体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威廉斯将此视为语言发展的重要过程，“某一些词语、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视、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1]。此外，威廉斯所收录的关键词并不是固定不改变的，其历史动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威廉斯在解释这些词汇的时候，会追溯其历史，并非常详尽地描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涉的对象及表达的意义。当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排列在一起的时候，词语的历史轨迹同时揭示的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另一方面，《关键词》在再版的时候会纳入新的词汇，这些新词的出现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直接反映。

布迪厄对语言实践的考察侧重关注语言背后涉及的社会结构与权力问题。语言学家将语法规则当作研究对象，布迪厄批评这种方法将语言分析还原为编码和解码的操作，而忽略了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语言的使用不仅包括了言说，还包括了理解、相信、服从和尊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还具有实践的特征。布迪厄批评语言学纯粹从内部视角考察语言问题的方法，认为社会学对语言的分析，要在三个层面对语言学的概念进行批判和替换。首先是用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来替换语言学的合语法性（grammaticalness），前者强调的是语言的合法化问题；其次是用象征权力关系来替换语言学的交流关系或者符号互动，它关注说话的价值和权力，而不是说话的意义；最后是用象征资本来替换语言能力，它突出的是说话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2]。

可以看到，布迪厄对语言的社会学考察，表现为一种与传统语言学相反的视角，选择对个体的语言习

性、语言资本和其所处的语言市场进行考察，这种理论策略与布迪厄关于行动的实践理论存在密切的关联。语言资本和语言习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而语言市场亦体现了场域的权力逻辑。个体的语言惯习通过在家庭、学校和特定场合的学习获得，这种惯习通过刻写（inscribed）进身体，使之成为身体秉性的一种形式。以口音为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它是不同群体和阶层在语言上的反映。个体亦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特定的发音风格，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性别认同。布迪厄认为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它成为身体秉性的一个维度，个体通过它来表达与社会世界的直接关系。并且，这种身体秉性亦成为社会阶层和语言之间的重要中介^[3]。

在语言市场中，不同阶层和地区的方言会对合法化的语言发起挑战。后者主导了语言市场，即会成为“标准”，对抗其他表达方式的价值。在历史上，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合法化和标准化语言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建设。其中，有代表性的建设行动包括了词典和语法规则的编纂、规范化语言使用及针对国民的语言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的语言，实际上只是一种“正常化”了的语言。在建构和合法化官方语言的过程中，教育系统发挥了关键角色。19世纪教育系统的壮大，教育、语言和劳动市场的统一，直接贬低了方言的价值，亦在语言实践中建立了新的等级^[4]。

并且，在语言市场的张力场域中，“合法化的语言”是一个存在竞争的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变迁剧烈的历史时期。在布迪厄提供的案例中，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语言统一政策，与君主制国家的建构过程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时期，地方资产阶级在语言政策上将自己掌握的官方语言提升为民族语言，以此给予自己政治上的垄断地位^[5]。结合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词义以及使用方式的变化，显然不是一个自然化的平稳过程。

在中文语境下，以词典这种知识产品为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呈现了一个语言与社会变迁的独特个案。在现代性转型的剧烈时期，出版发行了大量解释新术语和概念的词典。例如，《新主义辞典》（1933）、《新知识词典》（1934）和《新术语辞典》（1936）。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降，面对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生活，各类“新”词典应运而生。今天看来，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术语已经失去了“新意”，但是

在彼时，作为语言市场上流行的新产品，对旧传统进行否定的同时，可以巩固自己在语言上的合法地位。这与布迪厄描述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政策，通过净化语言来实现革命思想的净化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词典对语言的合法化功能，会体现在词语的分类策略上。表面上看，它以一定的语言学标准对词语进行分类。但是，这种语言学分类实际上也蕴含着一种社会分类的表达。许多词典会标明汉字或者词语在古代、民族和方言上的用法。在陈刚编纂的《北京方言词典》中，《凡例》部分使用特殊符号来对词语的词性和来源进行分类。例如，<宫>指宫内用语，<行>指解放前各种行业的内部用语，<旧>指旧社会和旧意识的词语，<流>指新社会流氓阿飞的特殊语^[6]。这些单个汉字构成的“特殊符号”，在语言学意义上对词语进行了系统分类，同时亦在社会学意义上指示了词语背后所表达的不同时代、群体、阶层和文化。上述旧时代的语言，在当代的语言市场中显然难有容身之地，但是，经过改装或者赋予新意义之后，会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被使用。

威廉斯和布迪厄的研究带有阶层分析的色彩，可以启发我们对青少年流行语的研究。不过，这里的青少年群体并不是指涉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或者位置的阶层，而是指涉在年龄上存在差异的代际群体，它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群体之间围绕语言的交锋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主流”与“非主流”之争，一直贯穿在语言的发展历程中。威廉斯和布迪厄的启发意义在于，对青少年流行语的考察，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检验与解读，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即便存在语言学上的标准，我们亦很难使用“正确”和“错误”来对它们进行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代表了以“合法化的语言”为标准，对语言市场上的新语言产品进行批判。

二、青少年的语言共同体： 网络时代的符号相遇与区隔

在青少年研究领域，学者意识到流行语是进入青少年世界的有效途径。对青少年流行语的考察，会将社会文化和心态变迁当作重要的情境性因素，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形成区别。并且，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青少年流行语发展出了新的特征。

在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北京青少年流行语的分析中，杨长征指出青年研究需要避免纯语言学的分析，关注青年流行语的流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心态的关系。杨长征将北京青少年流行语分为六类，分别涉及主观评价、人际交往、文化娱乐、两性关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7]。这些流行语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反映，亦揭示了彼时北京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闹琴”和“跳霹”，分别指吉他爱好者斗琴和跳霹雳舞，作为彼时吉他热和霹雳舞热的反映，它们揭示了“文革”之后青少年日益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因为一些流行语表现出粗鄙的色彩，杨长征认为这批80年代前后的流行语，严格意义上是在底层社会的青少年中流行。各种戏谑、比喻和夸张，对“正常”语言的反动，成为青少年独特的“语言文身”，亦作为“青少年特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8]。语言病和语言文身的提法，不仅揭示了语言实践的群体特征和文化认同，亦反映了主流文化对这种现象的拒绝态度，甚至将它们视为语言污染的异端。

进入互联网时代，90后和95后的兴起带来新的语言现象，许多网络相关流行语成为这一群体独特的身份符号。青少年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共同体，作为一种布迪厄所谓的身体秉性，在语言实践中表达自己的自我甚至是性别认同。因为表现出独有的特征，许多流行语不易为成人世界所理解，甚至成为一种典型的“自说自话”的现象^[9]。尤其是以中文、标点符号、数字和非正规汉字符号构成的“火星文”，成为青少年特有的语言和文化标签。这种具有符号视觉化特征的网络方言，具有制造交际障碍的“反网络性”^[10]。同时，这种语言游戏还带有隐语性质，便于青少年维护自己的空间和领地使其不为“外人”所窥视，很快成为青少年中的潮流^[11]。在这里，网络语言代表了一个青少年亚文化的符号体系。作为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表达反叛情绪的后果，其随意性和个性化挑战了现实社会中的语言规范，青少年亦将这种打破规范当作自身与成人社会的区隔^[12]。

面对青少年独特的语言现象，在社会和文化取向的语言学研究中，学者认为个体并不会被动地接受给定的社会分类。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性和关系性的建构，它来源于社会行动，而不是个体内在的心理品质或者固定的人口统计学分类。因而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成为身份认同研究关注的重点^[13]。换言之，在

存在等级差异的语言市场上,虽然会有合法化的语言作为标准,但是青少年会形成自己的语言策略。借用杨长征“语言文身”的隐喻,青少年会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符合自身审美的文身图案,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群体性特征和认同感的表达。

在人类学家的观察中,认为人类的社会关系通过语言符号为中介实现相遇和相互连接。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对时空的压缩,使得这种相遇并不需要面对面的互动,特定的符号现象或者交流过程,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将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连接又可以称为“符号相遇”(semiotic encounter)^[14]。在青少年的语言共同体中,流行语发挥了符号中介的功能,在个体之间建立了文化和认同上的连接。

但是,面对这一亚文化符号系统,安迪·班内特(Andy Bennett)提醒我们,传统的亚文化理论或者分析框架,是基于前数字时代(pre-digital)的历史经验,一种理论家“自上而下”对青少年建立的分层,指涉一个风格独特的群体。它依靠物理空间上的街道或者俱乐部形成独特的青年文化,相同时空中面对面的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亚文化概念已经变得陈旧。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和大众媒体关注并持续建构的对象,自上而下的亚文化理论模型失去了效力,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了反身性,青少年亦利用这一术语进行自我表达、想象和呈现。因而,班内特指出,在构建亚文化的时候,互联网压缩时空的诸多特性提升了当代青少年文化参与的机会,后者将互联网当作一种创造性资源(creative resources),利用互联网围绕知识、权力和唯一性问题,形成对自己有意义和“真实”的身份认同^[15]。

事实上,当我们谈到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人口统计学概念,一种根据生理和心理特征而建立的社会分类。这种分类固然会对青少年的自我认识和对同辈的想象提供参照,但他们亦会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在语言实践中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通过符号相遇形成共同体。一个比较显著的案例是网路中的“屌丝”文化。作为语言狂欢和无奈现实的虚拟释放^{[16][17]}，“屌丝”成为青年群体在网络语言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18]。类似的热词,如“白富美”“高富帅”“霸道总裁”和“土豪”等,这些语言符号代表了青少年所构建的“另一种”社会分类,同时亦折射出对自我

和他者的认同。“另一种”意味着在一个语言差异系统中,特殊社会价值的表达。这种特殊社会价值可能无法为主流或者“合法化”的语言及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所接受。在布迪厄的语言分析中,我们无法将社会可接受性还原为语法的问题,说话者如果缺少合法化的能力,那么他将从这种要求合法化能力的社会领域中被排除出去^[19]。但是,这些流行语在社会差异系统中代表了另一个空间。

在相对个体化的体验中,青少年借用了一系列的词汇来表达亲密的社会关系。例如,“饲养员”本意指一种职业,但是在青少年的用法中,用“饲养员”来指代父母。这种用法不仅表达了青少年在生活和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亦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将自己描述为被饲养的动物。在一些社交软件中,父母在通讯录中会以一些个性化的方式被重命名,如“父皇”“母后”“伏地魔”和“祥林嫂”,来自影视和小说的经典角色成为青少年调用的象征资源。不管名称如何,作为个体生活经验的反映,它们表达了青少年对父母和自己关系的理解和想象。

青少年通过语言实践构建身份认同,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提供了这样的狂欢性“虚拟身份”的分类选择,而恰恰来自对日常生活体验的表达。班内特指出,青少年线上或者线下的互动其实相互关联和重叠,我们不应该将互联网与面对面的互动进行二元论式的区分,线下和日常经验依然是青少年表达身份认同重要的影响因素,互联网成为一种地方化的(localized)认同叙事中介^[20]。这里的符号区隔固然体现了青少年个性化和反叛精神的一面,尤其是对语言规范的挑战而言。但是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衍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理解“饲养员”在青少年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看到,在包罗万象的流行语中,许多带有狂欢性的词语实际上来自对公共事件或者热点新闻的反映。如“躲猫猫”“范跑跑”和“洪荒之力”,大家对这类词汇的理解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但是,另一类词语因为缺少与公共事件的直接关联,不熟悉青少年文化的人将难以把握它们的实际意义。如“凹”“生肉”“空降”和“吃土”,不同于火星文依靠字形的变体和符号来构成差异,这些词语在青少年的语言实践中偏离了本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这里,“凹”并非指示形状发生变化,而是英

文“out”的谐音，表达过时的意思；“生肉”并非指肉制品，而是指未经汉化的音视频；“空降”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意思，而是观看视频时跳过某一段落；“吃土”亦非字面的意思，而被用来表达过度消费之后的窘境。

与火星文的极端形式不同，亦不是选取汉字另造新词，“生肉”与“空降”这样具有中性色彩的词汇，因为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而完成了新的符号编码。但是，这里的符号区隔并不是因为词语本身在美学上的“怪异”或者情感色彩上的狂欢和戏谑，而恰恰在于它们所指涉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和行为。其中，许多词汇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有关。“生肉”和“空降”多发生在观看网络视频的情境中，青少年还可以利用视频网站的弹幕功能进行符号相遇与互动，甚至可以在弹幕中用“空降”刷屏，完成一次非实时性的集体出场。

因而，在青少年的语言共同体中，符号的相遇和区隔具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一种语言行为来看，青少年表现出很强的造词能力，除了新造的词语，亦有既定的词语被赋予全新的意涵，它们经常会对“合法化”的语言发起挑战；其次，符号区隔的背后，在语言学 and 美学特征之外，实际上也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区隔。在大量网络相关的词汇产生过程中，网络既是流行语创造和传播的媒介，同时亦是青少年的社会生活。

三、文化杂交：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语言实践

对当代青少年流行语的考察，一方面需要承认青少年语言实践的独特性。作为一套符号系统，青少年流行语表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青少年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共同体，并以此形成代际区隔。另一方面，也需要客观地看待这种语言发展的社会现象。互联网对日常生活中规范语言的冲击，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代际群体。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在互联网的媒介中，跨语际和跨文化的互动成为可能，在这种语言发展中，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交织和渗透，文化杂交亦成为语言的显著特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文化的交际必然会带来语言的接触互动，有时候甚至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状态。由此便衍生了词汇输入和外来语的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对语言问题的考虑，虽然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是无法将它处理为一个封闭和孤立的语言系统。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英语和现代日语的接触甚至是冲撞影响深远^[21]。在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新名词之战”中，以严复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在面对西方新术语和新名词的时候，煞费苦心翻译创造的汉译名词，富含先秦古韵，却最终不敌从近邻日本大量涌入的和制汉语^[22]。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许多名词和术语便来自对和制汉语的吸收、借鉴和转化。例如，严复以“天”来翻译“nature”、以“爱智学”来对应“philosophy”、以“联”来对应“corporation”、以“都拓”来对应“total”。如果不看英文，我们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在当代的汉语中，严复的翻译基本上属于被放弃的选择。词语之争背后，不仅折射出了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较量，还包括受传统经学思想熏陶的文人与赴日留学生群体之间的张力。

今天看到的青少年流行语，许多词汇亦是这种跨语际实践所带来的后果。在21世纪的青少年文化中，日本的动漫文化、二次元文化以及欧美和韩国的流行偶像文化，在这些词汇的形成、使用和流变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因而，不同于刘禾考察的19世纪中国现代性转型所衍生的汉语现代性问题，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当代青少年流行语所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情境。从词汇来源来看，游戏、影视、动漫和音乐为90后、95后词汇提供了丰富的来源，这几个领域是青少年兴趣最集中的地方。青少年创造和再创造了大量的“新词”，通过谐音、缩写、中英混合等方式，赋予旧词新的含义。

例如，“因吹斯汀”和“大丈夫”，分别是英语“interesting”和日语“没问题”的谐音。这些汉字构词背后，英剧、美剧和日剧成为青少年获得语言资源的主要媒介。另外像“up主”和“打Call”，则以中英混合的方式，表达“上传者”和“支持与助阵”之意。我们无法用语言学的标准来判断对错，它们在词源与词语构成上体现了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色彩。同样，这几个词汇的狂欢色彩并不强烈，尤其是后两个，是青少年网络文化娱乐生活的直接体现。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反映青少年文化娱乐生活的流行语在不同时代存在差异。前述杨长征考察的“闹琴”和“跳露”代表了彼时青少年中流行的音乐和舞蹈热潮与生活方式，它们并不为当代青少年所熟悉。反

之，“生肉”“空降”“up主”和“打Call”这类词汇在电脑和互联网尚未普及的80年代，同样无法被青少年调用并赋予新的意涵来描述他们的互联网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通过社交网络的大数据对青少年流行语进行收集和分析成为可能。在青少年大量聚集的社交网络平台，QQ指数用大数据采集了青少年流行的高频词汇，汇编成册出版^[23]。从方法上而言，对高频词汇和用语的大数据采集，相对于传统的研究者视角的关键词采集，更具有客观性和指标特征。在QQ指数采集的120个高频词汇中，虽然在语言学意义上可以概括为若干特征。例如，谐音、音译词、外来词、缩写等形式，但是，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在青少年的语言实践中，新的意义被生产出来。

如前所述，意义并非凭空而来，它是青少年社会生活的产物。事实上，许多流行词都是围绕青少年感兴趣的ACGN来生成和使用的。例如，“修仙”指仙侠类的网络小说门类，但是在青少年的用法中，用它来表示晚上不睡觉，熬夜看漫画、追剧或者学习的行为。“守门员”，本意是球类运动中队员位置的名称，但是青少年用它来表示游戏水平比较差的玩家。“欧洲人”则被用来表示游戏或者生活中运气好的人。此外，我们经常听到的“开黑”和“开荒”，都是对游戏行为的描述。前者指朋友间开着语言边互动边玩游戏，后者指进入游戏的初期，练角色升级和攒装备这类基本操作。

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流行词还表现为一种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语言实践，其文化杂交性来自于对不同来源的语言和文化的综合与调适。在热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英文、数字，以及包括英语、日语和韩语的音译词。在颇具代表性的用法中，韩语的“我们”“我们的”，其音译“wuli”被青少年大量使用，许多韩流明星成为他们的“wuli哥哥”或者“wuli欧巴”。此外，不仅有对英语、日语和韩语的改造，中国的方言也在青少年的互动中成为热词。例如，“做宝搞”源自长沙话，意为拿某人当傻子。在游戏场景中，青少年用它来调侃或者抱怨队友和对手的无知。粤语的“废柴”，本意指无所事事之人，青少年用它来表示坚持梦想，但是暂时经济状况不佳的青年。

在这些案例中，青少年流行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杂交色彩。ACGN固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互联网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连接，对日常生活的延伸和渗

透，使得这种杂交性相比于传统时代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更为迅速和全面。本文讨论的青少年流行词，许多都是互联网相关的词汇。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流行语”的归类，在一定程度上会限缩我们对青少年流行词的理解。

我们并不否认互联网作为媒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类视频网站、网络游戏、微信、微博、博客等社交网络的兴起，为青少年流行词的诞生、创造和再创造提供了温床与空间。在这个被极大压缩的时空中，词汇信息可以非常迅速地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流行词，不仅在网络中得到呈现，亦会在网络的连接机制中得到更为深远的传播。换言之，互联网和日常生活并不是两个存在坚固边界的领域。作为信息网络的平台，在词汇的创造和流行中，互联网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延伸，更是青少年可以调动和借用的“创造性资源”。

这种现象并不为青少年所独有。历史上新科技的出现，如收音机、电视和手机，总是会带来语言的变化，甚至是即时的语言后果（immediate linguistic consequences）。互联网与其他新技术的结合，成为语言变化的发源地（matrix）^[24]。例如，以颜文字（emoji）为代表的表情符号的兴起，甚至获得了《牛津词典》的认可，表情符号“喜悦的眼泪”（tears of joy）被评选为2015年的年度关键词。表情符号在网络互动中的广泛使用，代表了当代书写和文字的进化，甚至为全球化时代的通用语言创造了可能^[25]。电脑媒介是语言发展进化的场所，互联网对语言的冲击，并不会带来语言的终结，反而是语言发展变化的沃土。

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的对互联网和语言的讨论表现出中立化的特征，认为网络语言虽然会对日常生活中的“标准”语言形成冲击，但是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语言属性，像衣服的潮流一样会随时间发生变化^[26]。这种来自语言学的“客观”描述并没有涉及网络世界中不同群体围绕语言形成的身份认同与潜在的冲突。从宏观角度看，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网络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多语种的语言共同体。其中的语言规范并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个体亦可以属于多个言语共同体^[27]。在这一共同体中，代际群体之外，还存在族群、文化和地理上的分类。这也意味着我们采用主流与非主流、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分析框架，可能面临简单化的风险。换言

之,这背后包含的语言冲突、接纳和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发展和变化的问题,文化杂交背后还涉及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就青少年流行语而言,青少年不仅是文化研究学者所谓的“文化移译者”^[28],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语言移译为自己的语言,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结晶与意义世界。

四、结束语

本文考察了青少年流行语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虽然许多流行语都是网络相关的词汇,但是它们并不只是对虚拟时空的反映,而恰恰来自当代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实践。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为不同群体和文化的遭遇和碰撞、吸收和调适创造了可能。这

一弹性空间对语言发展和变化的冲击,并非只针对青少年群体而言,而是表现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全球现象。

具体在中国情境中,青少年在语言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共同体。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利用互联网这一创造性资源,青少年通过语言符号完成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建构,并作为一套亚文化符号体系,与成人世界形成区隔。当然,在美学和符号学的区隔意义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许多流行语的生成和使用,是对青少年日常生活实践的反映。尤其是当亚文化对青少年而言已经具有了反身性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与互联网交织的世界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去接受它。■

何祎金: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守建

参考文献:

- [1]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M]. 刘建基,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2-3.
- [2] Bourdieu, Pierre.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7, 16 (6): 645-668.
- [3] [4] [5] [19]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86, 49, 47, 55.
- [6] 陈刚. 北京方言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2-13.
- [7] [8] 杨长征. 80年代前后的北京青少年流行语 [J]. 青年研究, 1993 (1): 21-48.
- [9] 邓丹良. “网络流行语”与青少年“自说自话”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4 (4): 21-23.
- [10] 陈佳璇. “火星文”: 网络语言的新发展 [J]. 修辞学习, 2008 (4): 41-46.
- [11] 于全有, 裴景瑞. 一种新型的网络语言——“火星文”论析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9 (2): 148-152.
- [12] 杨鹏. 网络文化与青年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125-127.
- [13] Bucholtz, Mary. White Kids: Language, Race, and Styles of Youth Ident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
- [14] Agha, Asif.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 [15] [20] Bennett, Andy. Virtual Subculture? Youth, Identity and the Internet. In Andy Bennett, Keith Kah-Harris (eds.),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68-169, 166.
- [16] 李礼. 网络亚文化的后现代逻辑——对“屌丝”现象的解读 [J]. 青年研究, 2013 (2): 69-81, 96.
- [17] 张洪忠, 张燕, 王雨欣, 宋伟超. 无奈现实的虚拟释放: 流行语“屌丝”的网络建构 [J]. 现代传播, 2014 (11): 50-54, 59.
- [18] 李明洁. “屌丝”的身份建构与价值观博弈——兼谈语言身份的特殊性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3): 81-88.
- [21] 刘禾.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 [22] 黄克武. 新名词之战: 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8 (62): 17-58.
- [23] QQ指数. 95后热词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24] [28] Crystal, Davi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5-228, 242.
- [25] Danesi, Marcel. The Semiotics of Emoji [M]. London: Bloomsbury, 2017: 14.
- [26] Danet, Breda & Herring Susan C. The Multilingual Intern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 [27] 彼得·伯克. 文化杂交 [M]. 杨元, 蔡玉辉,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51-55.